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 冲突与社会发展

潘建雄 赵志一 何 况 郑绪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短暂的时期，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将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转折点。以开放与改革这两个口号为标志的新的潮流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中掀起巨大的冲击波，它正在把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推到一个新的起飞线上。封闭的窗口打开了。中国终于真正投身到国际社会之中了。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开始重新审视当今的世界和我们自身。当我们一步一步开始朝现代化社会迈进的时候，新的矛盾、新的冲突、新的挑战逐渐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而所有这些冲突与挑战无一不反映在两种文化心理的对立中，即开放性的文化心理与封闭性的文化心理的冲突。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将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新旧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甚至还会出现一定的混乱和动荡。从社会学的角度，描写与分析这些冲突的过程与现状，追寻其社会历史根源，从对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探索中预测冲突的结果并提出我们的对策，这就是本文的意图。

一、飞旋的时代

用“飞旋”的字眼来形容一个时代多少带有一点艺术家的浪漫气息。我们不妨先想象一下康德和拉普拉斯的那一团高能量的星云。它在不停的旋转中产生出两种对立的力量，一方面由旋转而产生的向心力使它的中心密度不断增加，从一团松散的星云凝聚成一颗密集的行星；另一方面，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又不断地把多余的物质抛开去，使其脱离中心物体形成其他天体。这种吸收与排斥共同运动的现象同我们开放后冲突中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从1978年到1985年这七年中间，大量的外来文化涌进了我们古老的国度，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到最低劣的色情录象，从最新潮的迪斯科音乐到极古老的基督教文化，从牛仔裤到微电脑，几乎是无所不有。尽管所有这些并不都是当今时代的产物，但是它对一个经历过十年几乎完全同外界隔绝的国家来说，带来的新鲜感和社会冲击是极其惊人的。这些外来的文化潮流同我们原来的文化交汇在一起，两流相撞，形成了强烈的旋涡中心，带动着我们整个文化心理格局的变迁。

回顾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把它按照时间次序和不同的冲击点，归为四股冲击波及由此形成的旋涡中心。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变动。尤其是1978年，开放政策向全世界宣布以后，居住在港澳地区的大量同胞怀着新奇和思乡的心情纷纷回内地观光探亲。

一些港台流行歌曲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在这一人流中被带进了内地，并开始在一部分青年中逐步流行了起来。从这些歌曲的内容来看，几乎千篇一律，不外是花草云月，相思离别，伴之以优美的旋律和轻松的节奏。这些东西无论从其艺术性还是思想性上来看，均非上品。但是它们都有一个突出的迷人之处，即强烈的娱乐性。这对当时由于十年动乱几乎处于娱乐饥荒之际的青年来说，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们的国家在这不久以前还是处在十亿人看八台戏，一切文化艺术均“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提娱乐享受便是大逆不道的状况之中。这些流行歌曲的涌入，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它从最初的私人家庭走进了公共社交场合，从待业青年的庭院走进了大学生的宿舍，从单功能的“小三洋”走向了立体声四喇叭……。

对此，一位颇有名望的音乐教授作过这样一种评价，他说：“邓丽君的歌曲好比是白开水，它在人们饥渴的时候，最能满足需要，而一旦这种饥渴过去之后，就不会再有人问津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说他的话只对了一半。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流行歌曲进入大陆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文化思潮和社会气候，当一阵最初的冲击波过去之后，旋涡还在飞旋，大量的东西开始沉淀，波纹开始向外扩散，其社会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当邓丽君开始逐渐被人冷落的时候，又出现了奚秀兰、张明敏。同时一大批以演唱流行歌曲为主的国内歌星也涌现出来。“校园歌曲”、“乡村歌曲”的名词开始出现在音乐舞台上。与此同时，跳舞之风开始在一些大城市中逐渐兴起。大量的以娱乐消遣，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为主的刊物纷纷涌现。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谈论娱乐消遣，谈论服装穿着，谈论吃食家具。“流行”的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服装、发式、家具一切都讲“流行款式”。在我们这个历来以俭朴、实用为美德的社会，人们的观念受到了新潮流的冲击。一系列的观念冲突产生了。这是对外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受到的第一次文化冲击。

第二次冲击来自于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其中突出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它在人的文化意识的更深一层形成了另一个漩涡中心。

1979年4月16日到5月16日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行10人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访问了美国——请注意，这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第一个访美代表团。当时国内外的一些报纸也作了醒目的报导。这一访问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由于哲学与社会科学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长期以来，我们在同西方的社会科学之间建立了一道森严的壁垒。通过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这种壁垒更是变得密不透风。如果说在五十年代我们还常常通过批判的角度对诸如存在主义、实证主义等当代西方哲学与社会学说作过一些介绍的话，那么到了六十年代以后，连这些批判的研究也消声匿迹了。因此这一个小小的10人代表团的访问，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学术意义。同年11月，在山西太原召开了“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山西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一些主要报刊都发了消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西方当代哲学热。从1980年1月份开始，在一些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评作。关于人的问题及异化问题的讨论也开始产生了。全国最大的报刊之一《光明日报》从1980年5月开始辟了一个题为“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介绍”的专栏。以每周一期的版面连续登载了十一篇文章，介绍了十一种西方现代哲学，其中包括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塞拉斯的自然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几乎涉及到了当代所有比较有影响的流派，这在建国以来是罕见的。这些大量西方哲学的涌进，在学术界尤其是在当时的青年大学生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萨特的存在主

义。我们知道，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忧虑、伤感、悲观、失望成了普遍的精神状态，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危机的产物。它以研究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为中心，以人的忧虑、悲伤等甚至死亡的经验为自己哲学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思潮的中心移到了法国，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一方面继承了早期存在主义那种悲观、虚无的情绪，同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成分，即强调人的本质、自由，强调“自我选择”，形成萨特的所谓“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既有消极厌世的悲观主义成分，又有强调“自我塑造”、强调“自由意志”的积极因素的思潮，特别容易在对生活感到迷茫、幻想遭到破灭的人们中引起共鸣。刚刚从十年浩劫中挣脱出来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这种思潮得以滋生的土壤。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人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人们仿佛是从一场恶梦中醒来，可怕的梦境依然缠绕着人们的记忆。对于相当一批处世未深，而又感受到欺骗的青年来说，旧的偶像破灭了，而新的价值准则还没有牢固地确立，出现了一阵被人称为“信仰危机”的时期。这种气候无疑是有益于存在主义这一类思潮的传播的。

1980年5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它对当时的这一段历史是一个出色的注脚。事情的起因是一份全国性的青年杂志《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署名“潘晓”。在这封信中，通篇充满了伤感失望情调，表现出一种不甘沉溺却又无能为力的抗争，一种由于理想过于纯真而在现实的重压下遭到破灭而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和抱怨。围绕这封来信，一场关于人生意义和个人价值的大讨论爆发了。讨论持续了七个月，编辑部收到来稿57,000多件，如此强烈迅猛的反响，为该杂志创办以来所未见。在这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中，青年们所表现出来的苦闷与激情是惊人的。当时，《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写道：“从大批同情潘晓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我们这一代青年在饱尝痛苦失望之余，曾产生过某种幻灭之感。有些青年虽有不同程度的迷惘，但是，他们强烈向上的进取精神未衰，渴望在新长征中有所作为。即使是有些牢骚，本质上也还是想要同社会一道前进的。”这一评论是相当中肯的。这场讨论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本身就说明，他们是怀着一种强烈的进取精神而探索的。消极与悲观只是浮在深沉的大海表层的一层泡沫。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既然是一场讨论也就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一些青年从对理想的失望走到了极端的“自我”中去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并不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引进造成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混乱，而是相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特定条件，才使得存在主义哲学在一部分青年中间流行起来，指出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存在主义既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社会造成一种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它的时髦也不过是一阵子的事情。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的探索并没有结束，并且重心日益在向深处移动。从那个时期以后，学术界出现了一阵异常活跃的时期，从哲学的探讨到历史的反思，从对人生价值的探讨到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再论，甚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再探讨与再认识的提法……。终于，一场“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大讨论爆发了，这次它的主要当事人已不再是那些易于冲动的青年，而是一些成熟与渊博得许多的学者、作家了。

如果说前两次的文化冲击波在某种意义上说还仅仅是由于外来文化同中国特定社会相交汇的结果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冲击波则更多地带有当代国际社会的色彩，其源头就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众所周知，自从1978年开始，中国正式走上开放道路以后，从中央到民众

都在心目中确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使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在这种心情与环境下，当时我们对世界性的发展潮流，处于一种相对的比较敏感的时期，因此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出现就马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托夫勒认为，过去的时代是一个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而未来的时代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假说，他认为面对这样一种新的文明的浪潮，处在各种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可以站在同一条起飞线上，也就是说，处在第一次文明阶段——即农业化阶段的国家，可以跳过第二次浪潮——即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第三种文明，即信息社会中去。这对我们有些人来说，无疑有着难以形容的诱惑力。如果一切如他所说，我们只要抓住这一次时机就立即可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不必沿着工业发展的漫长道路蹒跚而行，这是一种何等令人振奋的前景！

从1984年3月到11月，是学术界最热闹的时期，光六月份收录在报刊索引资料中“新技术革命”和“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的总题目下的文章就达68篇之多，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学术“热点”。这些研究和探讨，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加深了我们对现代化涵义的认识，同时还把大量新的知识领域、新的学科介绍了进来，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尤其是知识界对“现代化”的太学习。据一份对大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读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人数比例高达78.6%。

在这一段时期，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舆论界，都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气氛。美好的前景在向我们招手，似乎人们感到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在我们古老的国土上出现。但是，这样一种乐观气氛很快被人们意识到有点过头了。现代化的道路还很艰苦，改革的过程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复杂得多。

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重“礼义”轻“功利”的社会，无论是作为一种处世原则还是作为一种生活理想，它都提倡人们去追求自我的道德完美而反对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所谓的“正其道不谋其利”。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还继承着孔子时代的伦理准则，而这种带有传统中国封建社会色彩的价值观念通过十年内乱中极左思潮的加工，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想象，一旦中国社会走向开放，这种价值观念势必将受到一场严重的冲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次冲击波及由此而产生的第四个文化冲突的旋涡中心。如果用一个最通俗的字眼来形容这场冲突的焦点的话，那就是一个字：“钱”！

1979年2月，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放政策以后的三个月，国务院发出文件，要求把广东省宝安县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接着又批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同年7月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同意在深圳与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下达文件，把特区的名称定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同时特区的范围又扩大到厦门、汕头。“南窗口”建立起来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以惊人的速度繁荣起来，成了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同时在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地区，出现了一批靠经营贸易而发财的“万元户”，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村整个乡都成了“万元户”。人们发了财了。这一股风迅速地吹到了内地，在1984年前后，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作为一种对观念变革的提倡，舆论界开始大量报道这些发了财的人们，介绍他们的事迹。随后，“能挣会花”的口号开始出现在报纸上，甚至有的报纸还号召共产党员应带头富起来。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谈论“生财之道”，弃学从商、弃政从商几乎成了时髦的风气。仅就报纸上公开报道的来看，就有新闻记者辞职经商的，电

影演员辞职经商的，刚毕业的大学生辞职经商的，甚至一位年仅21岁的武术冠军也办起了××公司。五花八门的“实业公司”、“贸易中心”如雨后春笋，遍地而起，且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除了这些堂堂皇皇的“公司”、“中心”以外，大量的个体商贩遍及全国。到1985年4月为止，全国已发展到9,304,000户，从业人员13,031,000人，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这还不包括为数相当大的无证商贩和以经商为第二、第三职业的那部分人。如果把这部分估计数字也加上去，那就更大了。

这一股“致富发财”的冲击波很快也波及到了国营企业中，讲究经济效益成了企业家们的口头禅。极端的现象也必然会由此而起，有些单位在“讲究经济效益”的口号下，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不计客观社会效果，一味想着赚钱。大量冒牌产品的出现与当今武侠小说充斥市场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据报道，由于大量纸张被用来印刷这些畅销的通俗读物，连学校的教科书都快印不出来了。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甚至有的国家机关，象公安局、检察院这一类历来被人们视为最严肃的领域，居然也办起了“贸易公司”。而有些既无“货”，又无“权”的单位，则开动脑筋另找窍门，变相出售“记者证”之类的事情也就发生了……，这一些极端的事例，虽然不具有代表性，但却深刻地反映了这股潮流之猛烈。

在这样一种冲击面前，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危机与转变。尤其在一些青年与学生中间，1983年以前那种追求“人的价值”、“个性完善”，热衷于“自我设计”、“自我成才”的激情，经过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后的一段沉寂，突然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金钱的价值代替了人的价值，致富发财代替了“个性完善”。整个社会舆论的中心也随着这根轴心翻了个面。人们害怕自己成为“精神污染”的受害者，但谁也不担心成为金钱污染的受害者。北大的教授陶大镛对此感叹地说：“大家都去赚钱，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①

相当一部分人开始为这种现实状况担忧，如此下去，会不会造成社会风气的堕落？会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酷无情？会不会使我们下一代从此污染上钱的嗜好而失去远大的志向？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看起来经济确实搞活了，市场也确实繁荣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以上，我们以这四次大的冲击为中心线索，勾画了自1978年以来，外来文化冲击的基本轮廓。回顾这一段过程，我们得到一个最明显的印象，那就是对于外来文化的引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平稳的随机过程，它有着强烈的节奏性与起伏性。决定这种起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来自于这种文化引进本身所起的社会反馈。而在这整个输入、反馈的过程中，有着一个最为重要的“黑箱”，那就是人。

二、冲突的现实

人是文化的载体，改变文化首先就意味着改变人。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封建大一统政治形态和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心理上的封闭性，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巨大的惰性力。这种惰性力已经使我们吃足了苦头。对此，我们今天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切。所以，从1978年以来中央确立的开放政策是符合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要求的。

然而，一旦这种开放真正实现，由于大量外来文化的冲击，马上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

^① 《群言》创刊号，1985年。

压力。产生这种社会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人的观念深处所发生的两种不同的变化心理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无孔不入，从最浅层的日常生活趣味到最深层的社会价值观念，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冲突点，而要揭示这些冲突，仅靠我们前面所用的那种宏观的概述方法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深入到当代人的现实生活态度，观念情操以及价值取向中去。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节中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为了使我们的探讨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并获得可供展开分析的第一手资料，我们首先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按照不同年龄层次和职业状况，作了一次大样本的社会态度测量。测量是采用问卷的方法进行的。投放问卷330份，实际回收285份，有效回收率为87.3%。整个问卷由30个态度指标和一个附加的特设指标组成。这些指标分成八大类，全部采用封闭式结构，然后按照“李克特尺度法”加以打分，每个问题设五个等距，由对象自由选择。总得分范围在30分到150分之间，前者表明是极端传统型的，后者表明是极端开放型的。以90分为中心。低于90分说明倾向于传统型，超过90分说明倾向于开放型。

经过数字处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大量的外来文化通过四次重大冲击进入到我国，但是传统性的社会文化心理依然还在人们的观念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因此，至少在目前，认为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还为时过早。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属于传统文化的那方面优势已经很微弱了，新思潮正在逐渐崛起，向旧的传统观念发出挑战。这一切，正反映了当代人的观念形态正处于变革与冲突之中的特点。从统计中我们看到，大部分人的得分都处在80—100分之间，占总数的72.8%，处于极端传统型与极端开放型的人数都不多。从表一可以看到按强度分类的结果。

表一

类 型	极端传统型	传 统 型	倾向传统型	倾向开放型	开 放 型	极端开放型
人数 (%)	2.1	16.8	38.9	33.9	10.4	1.7

我们在这次调查当中，没有按照任何一种理论划分来决定我们的分类，而是尽可能真实地从目前实际生活状况和社会现象出发，确定我们的考察范围。我们认为，作为一次实际的社会研究，具体、翔实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过分的思辩性只能破坏它的有效程度。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们确立了如下八个实际考察范围：①日常生活方式、②民族自尊心、③人际交往态度、④个人进取精神、⑤社会共存感、⑥社会等级观念、⑦伦理价值观、⑧对金钱的态度。毫无疑问，这样的分类是有缺陷的，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它缺乏条理性。但也有它的长处，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它们基本上反映了目前存在于我国社会中文化心理冲突所触及的基本的敏感点。通过这样一些分析调查，我们发现了当代人文化价值观念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及心理冲突的一些重要特点。

(一) 观念变革的非同步性。在表层文化中，开放的意识占主要地位；而在深层文化中，则传统的因素占主导地位

在我们设计的八个主要大类中，得分最高，也就是说最倾向于开放型的，是第一类，即有关衣着打扮文化娱乐方面的一般日常生活方式。得分最低，也就是说最倾向于传统型的，是伦理价值观。在所有的年龄组中，几乎都是如此。

举例来看：

表二

问 题 5	现在,青年对流行音乐很入迷,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倾向				
态 度	赞 成	有点赞成	很 难 说	有点反对	反 对
%	4	9.8	25.4	16.2	44.4
问 题 6	对于人们的服装打扮,完全应该不加干涉,谁爱穿什么,就穿什么				
态 度	赞 成	有点赞成	很 难 说	有点反对	反 对
%	56.2	19.3	6.2	11.7	6.5

在这两个问题中,持开放态度的比例分别高达60.6%和75.5%。这说明,人们基本上都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现实从一开始就能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流行音乐与流行时装是随着第一次文化冲突就进入了我们内地,可以说他们同其他文化现象相比,有着最长的开放历史,也可以说经历过最多的反复。

如果说,在关于日常生活方式的外来文化影响已经比较普遍被接受的话,那么在人的伦理价值观方面,人们却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传统性。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有关家庭关系中的伦理观念。下面是30个问题中,得分最低的一个指标。

表三

问 题 16	在家庭关系中,孝敬父母是最重要的				
态 度	赞 成	有点赞成	很 难 说	有点反对	反 对
人 数 %	64.8	26.2	5.3	1.7	2

我们都知道,“孝”的观念是中国传统中最根深蒂固、最具有特色的内容之一。这既同中国封建宗法家族制的社会结构长期稳定有关,也是儒家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当然,从这里,我们不能得出当代人的思想在倒退这样一个结论。因为,当代人在维护孝敬父母这一伦理原则的时候,已经在这“孝”的观念中,增添了大量新的含义。包括维护社会公德、协调代际关系、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等。因此,未必可将之与孔子时代的“孝”等量齐观。但是作为家庭关系中的“头等原则”,显然与西方社会所提倡的普遍平等原则是相左的。

此外,还有一个指标同样能充分地反映出在伦理价值观中传统性的特点。

表四

问 题 15	俭朴与谦逊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今天仍然应该发扬				
态 度	赞 成	有点赞成	很 难 说	有点反对	反 对
人 数 %	60.3	16	14.3	5.2	4.2

这一个观念,有10%左右的人表示反对,这一部分反对的人主要集中在大学生中。由于

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特定的社会地位，比较强调“自我发现”，同时还受到一种较强的进取心与事业心的鼓舞，因此出现了一种反传统的心理倾向。但除此之外，总的舆论倾向与人的心理状况，都还是崇尚着那种传统式的美德。自大与骄狂，历来是中国传统中视为不良的心理素质。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保持着这一点。直到今天，那种楞角过于分明，锋芒太露而不知收敛的人，依然是不受欢迎的。

从上面的对比材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文化越是接近浅层，就越容易发生变迁；而越接近深层，则越难发生变化。这种文化变迁的非同步性可以看作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的普遍现象。指出这一条规律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正确估价开放后社会变化的进程，开拓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避免那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

(二) 价值判断中的双重标准成为当前文化心理冲突现象

就文化心理冲突的表现形式而言，它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价值判断中多重标准的存在，是其中一种相当典型的表现。所谓的价值判断的多重标准，是指人们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准则在同时发生作用。它可以表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同一个人判断同一类事物时，常常会依据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发生摇摆；另一种是某一群体，可以是某一社会集团，也可以是某一社会阶层，对于两种对立的价值准则同时表现出可接受的倾向，而导致内部的不一致。

在任何社会，任何个人中，这两种现象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但是，只有在一个处在急剧的文化观念变革之中的社会里，它才会表现出普遍性和尖锐性。

首先，我们先从社会平等观念上来考察这一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等级意识是很强烈的，作为封建礼教支柱的三纲五常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建国以来，我们不断地宣传着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包括官与民的平等，不同职业的平等，男女之间的平等。但是在实际生活领域与人的观念形态中，传统的等级意识却依然顽固地保持着，这对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而言，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表五

问题 20		当干部的只要工作有成绩，享受一点特权是应该的		
态度	赞成和比较赞成	认识	反对和有点反对	
人数 %	41.5	10.3		47.7

这里请大家注意，赞成和反对的几乎旗鼓相当，各占40%以上。一个受到40%以上的人支持的价值判断说明它在人的观念中有着强大的心理基础。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有着很强的心理基础，那么人们就很难找出究竟哪一种为该社会中占主导性的价值准则了。导致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无疑是这两种价值准则都有被社会接受的倾向，即价值判断中的双重标准被同一阶层的人们所接受，而根源在于两种文化心理所造成的一种相峙现象。

除了这种情况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相当典型的另一类表现形式。即同一个人判断同一类事物时，常常会依据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发生摇摆。请看下面两个命题：

问题 24	人应该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充分表现自己的才能和个性
问题 25	做人要讲策略，生活中太出头的人往往是吃亏的

显然，这是两种根据不同的人生价值观而提出的互相对立的命题。前者鼓励“自我表现”、“自我出头”，这无疑是开放以后，外来文化所带来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而后者则是我们根据“出头椽子先烂”这一句中国传统格言，用现代语言翻译而来的。它主张“明哲保身”，避免“出头”、“冒尖”，是很带有典型性的传统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两个命题的对立性很强，而且在问卷中编排在一起，按理说是不难辨别的。但调查的结果却几乎令人不可思议，只有41.7%的对象能够明确地表示接受某一观念而反对另一观念，而大多数人，占总数的58.3%，居然对这两种观念同样表示赞许，或者赞许其中一个，但也不反对另一个。

我们特地找到了几个被调查对象，观察他们的思考过程。发现在判断这两个问题的时候，许多人竟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对立性而选择了一样的答案。于是我们有意作了启发性的提示，指出他的自相矛盾。结果，他们就会很快地意识到这种矛盾，重新调整自己的态度，作出了协调的选择。而有的人则对二者表示难以抉择，共同选择了“很难说”。

这一观察结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它说明尽管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时代条件，然而它却在不知不觉中同时渗透到人的价值观念中，甚至人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种价值观中双重标准的矛盾。这同我们近年开放后的现实状况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一方面由于开放和改革，带来了社会的急剧变化，开拓性和创见性成为在生活中和事业上获得成功的一种重要素质，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了传统的“不敢为天下先”的保守心理。前者以一种强烈的现实感有力地打入到人们的观念中，而后者则由于其源远流长的文化心理传统而深藏在人们心中，甚至人们还来不及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其结果，就出现了这种价值观中的双重标准的冲突。

(三) 生活目标的多层次化成为开放后最普遍的观念变化

人们一向认为，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这种文化具有压抑个性的全面发展与反对人们追求生活多样化的消极功能。

如果我们在这样一种文化历史背景下，考虑一下今天人们对生活目标的追求，那就不能不承认变化是十分巨大的。从理想、信仰、个性、事业、地位直至金钱，人们的一切追求仿佛已经得到了社会舆论的认可。生活从一个单线的长链，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变幻莫测的立体型的魔方，令人眼花缭乱，这里我们集中从“个人进取”与“对金钱的态度”这两方面分析一下我们的调查结果。

关于这两个方面我们各设置了四个指标，平均得分如下：

表六

平均得分	指标	个人进取意识	对赚钱的积极态度
20以下		3.16	3.20
21—30		3.35	3.17
31—40		3.28	3.26
41—50		2.84	3.18
51—60		2.17	3.15
总平均		3.19	3.28

注：得分在3分以上是倾向开放型的，3分以下是倾向传统型的。

从总的倾向看，对于这两种生活追求大部分人都持积极的态度。如果说，在对于个人的自我进取这一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态度的话，那么对于在承认赚钱动机的合理性上，却几乎表现出一致的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20—30这一年龄组之外，几乎所有的年龄组，对于赚钱的积极评价都高于对个人自我进取的积极评价。而20—30这一年龄组由于其人生周期的特点正处于事业开创的阶段，因此其自我进取意识高于其他年龄组是十分自然的。

我们认为最能反映近几年这两种社会心理对人们观念冲击强弱程度的，是表现在20岁以下这一年龄组的统计结果。这一组样本来源，大多数是在校的中学生以及少数刚进大学的新生。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基本上都还没有踏上社会岗位，社会思潮与社会风气对他们的影响要远甚于其实际生活经历所带来的影响。事实表明，金钱的价值比个人进取的价值对他们的影响要更强一些。

也许有人要问：难道这种个人进取与追求富裕的欲望都是开放所带来的吗？要知道，十年前的今天，如果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有“个人奋斗”或“发财致富”的欲望，其后果恐怕是相当严重的。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的话，就不难发现，这种极左的东西往往是与封建的东西、专制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的。这同今天人们的坦率当然是无法同日而语的，但是坦率只是表象，其背后蕴含的就是人的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的公开认可。这样，我们最终还是发现，这一切都是开放所带来的结果。下面这一份统计，能够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这一点。

表七

问 题 26	一个有野心，肯奋斗的人，应该得到社会尊重		
态 度	赞同、有点赞同	很 难 说	反对或有点反对
大 学 生	59%	31%	10%
退休职工	13%	21%	66%

从这里我们看到，处在文化冲突前沿，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大学生中，大部分人赞同这一命题。而受传统文化影响比较深，受外来文化思潮影响又比较弱的退休工人来说，这依然有点不合口味，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事实上，不管人们怎么理解，“野心”这一词汇多少总是同一定程度的个人动机相联系，造成态度分歧的原因恐怕也就是于此。在这里，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表现得十分明显。

但是不管怎么说，生活目标的多层次化已经成了被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新观念。在今天当你说道：“我要争取当个万元户”，已不必再耽心受到旁人的白眼；当你表示“我立志成为一个大学者”，只要不是出于狂妄，或许还会迎来别人的赞许；同样，如果你真诚地宣誓：“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别人依然也会肃然起敬。总之，人们已经相信，生活不再是一条单一的轨道。而是一个旋转的多面体，一个变幻莫测的魔方。尽管它的核心是信仰和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但它同时还能容纳许许多多其他的色彩。这正是我们整个社会当前的活力之所在。

三、冲突与均衡

任何一种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完全不受外来文化的渗透，纯粹依靠内部的新陈代谢，实现封闭式的自我更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拿人们习惯视为整体的“西方文化”来说，它本身就融合希腊文化、犹太文化、罗马文化、日耳曼文化等才发展起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反复出现尖锐的文化冲突时期。从这一点来说，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是整个人类进化史上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人们几乎一致承认，今天的日本的确创造出了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化格局。而日本人的这种创造行为，正是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大量吸收而实现的。在日本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学习外来文化的大高潮时期，结果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顺利地赶上了世界大势，第一次是在六世纪到八世纪，中国文化大量被输入日本，出现了被史学家称为“全盘汉化”的时期，其结果使其迅速地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社会飞跃。第二次是在十九世纪的中叶“明治维新”时期，为了摆脱当时的民族危机，迅速赶上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日本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几乎“全盘西化”的过程，其结果同样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对于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人们可以从各种途径去解释，我们只想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角度，指出在这一成功过程中两个极为重要而对我们今天又有启发意义的现象。

其一，当日本社会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它也经历过在某些方面同我们今天十分相似的文化冲突时期。它既受到来自传统文化的保守势力的反抗，也受到由于过分醉心于外来文明而盲目激进的势力的干扰。这种尖锐的文化冲突过程，反映了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其二，日本人在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采取了极为开放的措施，不管是对中国文明的倾心，还是后来对西方文化的狂热，都是极为强烈的。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所谓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用它的科学技术文明”。因而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就放弃了最初类似于我国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观愿望。这种愿望最初是以“东方伦理，西方技术”这样的主张而提出来的。当时甚至还有人提倡同外国女人结婚以改良日本人种的建议，至于那种认为“吃了猪肉就文明”、“打了洋伞就文明”式的可笑观点更是到处流传。但是，尽管这样，日本文化还是生存下来了，它既没有在古代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也没有在近现代被西方文化所淹没，相反，它在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化结构与内在精神方面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功。同时大量的传统文化形式也依然完好地被保存下来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不管它吸收多少外来的成份，它永远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同化，那种耽心在外来文化的大量冲击下，会失去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性的忧虑尽管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其实并没有多少道理。

从上述两种历史文化现象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文化引进过程中，产生各种社会压力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旧有均衡的破坏，正是文化变迁中必然经过的中间环节。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冲突是一种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历史现象，我们要有充分的勇气和精神准备来面对这种冲突。

但是，我们承认这种冲突，并不意味着任其自流，允许这种冲突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冲突本身只有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才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这种冲突实现一种新的文化均衡。在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冲突与均衡总是交替上升，

而且总是以相对的均衡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尖锐的文化冲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会产生。长期冲突的代价，是任何一个社会所支付不起的。因此，如何通过当前的这种文化心理冲突，而去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格局，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

有一点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外来文化的引进所造成的文化冲突，并不是总向着一个方向发展的，事实上，它会有各种岔道，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结果，甚至也会导致社会的暂时倒退。在这一方面，抱着盲目乐观的心理，认为只要开放，结果总会是好的，可以完全听其自然，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认为，正确的社会决策是成败的关键。在制订这种社会决策的时候，我们既要有敢于开放的勇气、卓越的远见和对于世界潮流的高度敏感性，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社会承受力和容忍度。事实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其本身的社会容忍度是有限的，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对于文化冲突所产生的社会压力的承受度也是有限的。低估了这种容忍度，会使我们在决定社会政策时趋于保守。反之，如果超越了这种容忍度，同样也会造成不良的后果。事实上，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一般社会都会通过功能反馈进行调整，这是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稳定而具有的基本功能。

当然，这样一种社会容忍度，其本身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不断开放的过程而不断扩展。就象一个人经受的风浪越多，其心理和生理上对于风浪的适应性也就越强一样。这是一种民族与文化的适应与应变的能力。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必将是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加强。面对着这种有增无已的大趋势，一个民族的未来前途很可能就在于这种适应性和应变性，在于它能否广泛地容纳各种其它文化的长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浅层的与深层的，这是我们现在就应当引起关注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当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社会改革，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候，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社会容忍度的存在。它是调整我们整个社会决策的一个重要参照因素。既不应该过于保守而犯神经过敏的毛病，也不能不顾国情与现状，盲目冒进。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规律，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的。

要正确地认识这种社会容忍度，其关键就在于要正确认识本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的特点，正确认识本民族伦理传统和民族心理的特点。正确认识本国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够在指导我国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中发挥巨大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党能够及时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一伟大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正是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国的合理融合。它不仅是一种政治策略上的指导原则，也是一条文化思想上的指导原则。

但是，想要在两种文化冲突的过程中，达到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平衡，光有对社会容忍度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找到一种正确的方法与一条正确的道路才能使文化冲突沿着我们所预期的目标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还必须找到实现这种平衡的现实力量和现实基础，这个问题要比前一个问题更为复杂。它至今在时时困扰着我们。

在最近这一时期中，人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社会学家、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或者其他人士，热衷于对文化冲突探讨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都在谈论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寻找东西方文化的最佳“熔点”。但是我们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尽管人们的动机是在寻找融合点，但实际上他们找到的却往往正是那些冲突点。比如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传统的群体原则，现代社会的普遍平等观念与传统的等级意识，如此等等。于是我们感到，似乎只要把这些冲突点翻个面，它就成了一个融合点。看来，寻找融合点其实并不困难，但是我们的认识却没有因此而得到多大推进。这就使人有点怀疑，这种表述方法与思索方向是不是十分有效？问题是，即使我们找到了融合的双方，那么这对立的双方是否能够融合呢？文化心理的变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它不象人们煮土豆，觉得太咸了，只要加点糖，觉得太淡了，可以加点盐，而盐和糖的调和结果一定不会辣，于是口味适中，食欲大振。假如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认为中国的传统的群体原则太保守，只要稍微加进点个人主义，中和一下，就一切恰到好处，那就有点太神了。使用什么方法来“加”呢？谁能保证它的结果一定是和土豆味道一样融为一体，而不是象油和水一样，分离为两层呢？谁能保证这两种本来对立的東西一定会在我们指定的融合点互相融合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吃过这种苦头了。比如，前一时期我们认为由于过分轻视人们的物质利益愿望，过于强调了金钱的消极作用，阻碍了人的积极性的发挥，于是就提出鼓励“发财致富”的口号。但是结果并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么有效。原来我们的目的可能通过鼓励人们追求富裕，促使人们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但事实结果却表明，许多人并不是热衷于创造财富而致富，而是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通过投机取巧，通过各种灵巧的手段而去获得财富。这样，社会的财富总量并不见多，而只是这些财富的分配形式发生了变化。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在于寻找这些“融合点”，而在于寻找一条“融合”的途径和方法，更确切地说，我们是在探求一条文化更新的路，一座通过文化冲突而走向新的文化均衡的桥梁。这就需要我们从原来的思维框架与思维定向中跳出来。如果我们至今仍然一味把视野集中在对两种文化的优劣、异同的比较分析中，恐怕很难走出前人多远。要探寻一条实实在在的文化更新的路，其依据不应在文化物质本身中去寻找，而应当从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中，从观念变革同社会决策的相互关系中，从文化冲突与社会冲突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这就需要我们在探索中增加一点现实感。

如果说，产生文化冲突的直接原因在于两种文化本身所存有的差异性的话，那么完成这种冲突达到新的均衡的途径与方法却不能够简单地从这种文化差异中直接引伸出来。它有赖于现实冲突中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转化，有赖于我们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这种冲突的规律和它的客观进程，有赖于我们实际所采取的社会政策和指导原则。此外我们还必须为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均衡找到一种现实的客观基础。

我们在分析自开放以来，社会文化心理冲突发展过程的时候曾经指出，整个外来文化的引进过程并不是一个平稳的随机过程，而是有着强烈的节奏感与起伏感。在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说，这四个文化冲击过程所形成的四个漩涡至今仍然没有汇集起来，它们依然围绕着各自的中心在旋转，有的快些，有的慢些，有的扩散圈大一些，有的扩散圈小一些。从目前来说，人们所感觉到的影响最大的是第四股潮流，即“发财致富”的潮流。据一份对在职工的调查结果表明，认为在改革以后社会上出现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做生意时兴”与“拼命多挣钱，为早日实现家庭现代化而努力”的人占总数的68.3%。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追求发财的观念，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我们民族整个文化心理平衡的背景。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拜金主义盛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

这种金钱崇拜的观念，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社会伦理观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在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个性解放、自由主义与金钱崇拜是平行发展的，形成了一种文化整体。否则我们就会难以想象这样一个社会怎么凝聚起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其欺骗性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伦理观念与价值观念，它毕竟还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自私本性起着一定的限制作用，同时也通过一定的社会立法形式对人的赚钱的手段起着一定的限制作用。

有一种现象令人不可理解。我们明明从事的是真正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是以往任何其它阶级都难以实践的，而我们却不敢亮出人道主义的旗号。我们认为畏首畏尾是完全不必要的，看一个主义能否实行，关键在其实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应该一方面提倡人们追求生活的多样化，提倡人们依靠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走合理致富的道路。另一方面还提倡人们充分追求个性的完善，不仅重视“金钱的价值”，同时还要重视“人的价值”，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同时它还强调人们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关系，提倡人们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它不仅是共产主义伦理原则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群体至上原则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升华。它不仅能够在改造我国传统文化心理，充分吸收当代先进文化因素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同时它还具有把目前的四个漩涡中心合为一体，形成现代中国民族文化的凝集作用，足以成为建立我们新的文化均衡的现实基础。它是我们从当前的文化心理冲突中实现文化更新的必经的桥梁。因此，我们认为，架起这一桥梁，是我们迟早要做的一项巨大的工程。

这里，我们不得不坦率地说，从1983年开始，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中，由于分寸掌握不好，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以致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讲“发财致富”可以堂而皇之，而讲“个性发展”却成为忌讳的东西。提倡尊重人的价值反而不如提倡尊重金钱的价值，这一切显然是不正常的。所有的这一切更加深了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因此，当我们意识到要建立新的文化均衡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还会旧话重提，在观念变革中走一段回头路。事实上，只要我们开放的政策继续下去，只要我们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我们还必须使人们相信，人的价值终究高于钱的价值，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终究高于拜物主义。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此抱过分忧虑的态度，它并没有超出我们社会的容忍度。

从这里，我们想引伸出这样一种看法，在近年来的开放过程中，我们在经济领域的解放程度超出了在价值观念中的解放程度，对经济决策研究的科学性与现实性超过了对社会决策研究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在浅层文化中的开放程度超过了在深层文化中的开放程度，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协调。我们必须重新树立这样的思想，社会决策如同经济决策一样，并不纯粹是政治，它也是一种科学。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王 颀